

語言歷史的跨文化闡釋

◎ 曹樹基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收入這本文集的11篇論文分別討論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晚清的「詩界革命」、革命話語與文學的關係。作者採用「跨語言實踐」的分析框架，對於中國「革命」一詞不僅進行語源學意義上的追根究柢，更從文化、意識和語言三者之間的關係入手，從語言角度對現代革命的起源及其相關問題進行詮釋，「以揭示中國革命經驗的某種本質」。在學術層面上，作者想弄明白，革命話語為甚麼能在現代中國產生深刻而持續的影響？中國革命的獨特性與中國現代語言的形成有甚麼關係？社會、政治層面的意義則如作者在〈後記〉中所稱：「我曾經不同意『告別革命』的說法，而我的『革命』研究，其實與那種說法沒根本不同，雖然在方法上似乎是『欲縱故擒』。因為我覺得，如果不知我們怎樣被『革命』所擒，則無異於不告而別，或告而不別。」我們——或者說中國——如何被「革命」所擒，既是現代語言學的問題，也是政治學、社會學的問題，它構成全書的問題核心，體現了作者這一研究的終極關懷。

第一、二篇論文都是討論「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但相對說來，第二篇論文是對第一篇論文觀點上的深入和細節上的展開。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著重討論二十世紀初「革命」、「かくめい」和「Revolution」的翻譯過程以及相關問題。關於這一翻譯過程的意義，作者在第二篇論文中作了相當學術化的表達，「這一過程不是以往所注重的翻譯史或翻譯技巧，而是翻譯的歷史條件及其語言行為，由此考察理論話語在不同文化之間翻譯的種種關係和形態」。

簡單地概括一下這一翻譯過程是有意義的（儘管這一概括可能有損原著所揭示的歷史的豐富性）。按照作者的觀點，中國傳統「革命」話語出自《易經》，基本含義是改朝換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其中也蘊含猶如四季循環那樣的王朝循環的必然性。中國「革命」話語傳入日本後，被改造成尊王改革之義，所以，「明治維新」和「明治革命」變成了同義詞。Revolution源於拉丁文中「天體周而復始的時空運動」，後來則被用於反政府叛亂，包括和平漸進和激烈顛覆兩種政治革命模式，也可稱為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兩種模式。

王韜、章炳麟和康有為等稱法國大革命中的民眾為「叛黨」，而稱叛亂本身為「革命」。作者指出：「像章、康這樣使用『革命』一詞，其實意味著他們對清王朝法定性的懷疑，同時不自覺地使清王朝失去了傳統革命話語的權威性資源，因此堵塞了使『革命』向『改良』或『改革』轉化或融合的可能性。」這就是說，「革命」一詞的這一翻譯，使中國因此而失去了按照日本模式進行社會改革的可能性。梁啟超則接受日本語境中的「革命」話語，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這個意味著「變革」或某種「歷史性的質變」的話語本與暴力反叛無

關，但因與舊有的政治「革命」糾纏在一起，且因被賦予歷史進化的普遍意義，因而更易被人接受，乃至成為人們從恐懼到擁護「革命」的關鍵。當梁啟超對他努力宣傳的「革命」後果產生懷疑以後，就力圖從社會變革和暴力奪權兩方面對「革命」一詞加以廣義和狹義的劃分。儘管他對狹義的「革命」持反對的態度，但他為任何暴力行為都貼上「革命」的標籤，就「反過來喚醒了黑暗的民族記憶，作了『革命』暴力的義務推銷員」。在梁啟超的後繼者如鄒容那裡，宣揚暴力手段的同時亦包含著有關民主和民族內容的社會變革的種種許諾，中國現代「革命」話語遂具有了世界性和現代性。中國不可逆轉地進入世界革命洪流。中國就是如此被「革命」所擒。

如果覆述這兩篇文章中更多更有趣味的細節，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些話語主體是如何「以革命的名義」重構歷史的。但也可以省略這些細節，因為，循著同一思路，作者的第三篇文章〈孫中山與現代中國『革命』的話語關係考釋〉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更詳細更精彩的個案：「革命」的歷史意義與詮釋意義如何被混淆？真實的歷史如何為革命的意識形態所掩蓋？雖然作者將語言意識與歷史再現、理論話語與權力機制的關係作為分析問題的基本線索，但這篇論文的實證色彩遠遠超過思辯。採用國學中常用的考證方法，作者廣徵博引，條分縷析地證明，孫中山有關自己早期革命生涯的自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他「先知先覺」「革命」形象自我塑造。孫中山的有關文本對於「革命」一語不加事實（歷史）意義上或詮釋意義上的分別，實際上是將「革命」作為一種被控攝的物件，體現了敘述者的歷史主動性，完成了歷史之構造。這一虛構的神話，即國父早期「革命」形象的虛構，在台灣、大陸兩地學者們的手中得以強化，直到最近才出現裂隙。此外，作者還認真清理了孫中山早期的思想構成，以及他在何時、何地、何種歷史及語言情境下接受了「革命」的話語，並賦予何種新的含義。這種發幽探微式的細緻研究，大致廓清了作為「革命」推動者，也作為「革命」鑄塑者的孫中山早期的真實形象。這一細緻入微的考辨過程，實在不是一篇短短的評論文章可以一一轉達的。

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不僅是孫中山，就是梁啟超後來在重寫學術史兼自己的革命史時，也以一種重構的革命的意識形態覆蓋其真實的歷史。這一切，與評論梁啟超的「詩界革命」有關。於是，就引出本書第二部分相關的三篇論文。其中，〈晚清「詩界革命」與批評的文化焦慮——梁啟超、胡適與「革命」的兩種含義〉最值得一提。在這篇分量頗重的論文中，作者還著力分析了作為新文學運動主將或「文學革命」領袖的胡適，在使用「革命」一詞時面臨的尷尬和困惑。這是因為，胡適與梁啟超都「力圖造成『革命』的詞義的轉化，力圖使中國的革命從其陰暗的歷史環境中走向更為廣闊的空間」，但是他們又「不得不處於革命的歷史語境中，遂產生他們那種特殊的文化上的焦慮感」。簡單地說，這種焦慮，就是「革命」的兩種含義造成的緊張。

既然「詩界」或「文學」與革命糾纏不清，那麼，概念的錯位就是必然的。在梁啟超那裡，他經歷了從強調詩歌形式的變革到強調「風格」和「意境」或「精神」變革的過程，對胡適而言，文學的精神（內容）和形式也被置於一種簡單的對立關係中，而精神總是被尊崇的，形式總是被貶抑的。作者由此作出這樣的結論：「這一模式的使用，與一定的歷史語言密切相聯：那種要求語言擔負傳達新文化的工具的迫切性，決定了文學的主要樣式是『寫實』的觀點。」「寫實主義文學與革命的意識形態相聯結，成為一種壓迫其他異於『寫實』主義文學的工具。」直至二十世紀30-40年代，「文學革命」讓位於「革命文學」，遂給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造成惡果。

作者並不滿足這一過於理論化的論述。在這一論述的基礎上，作者在本書第三部分的三篇論

文中，分別以丁玲、周立波、茅盾等現代作家的作品為例，討論現代「革命」的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學的關係。儘管我對現代文學所知甚少，但這三篇論文已讓外行讀者也明白，在中國，文學是如何成為「革命」話語的囚徒的。

由此可見，本書分為三部分的11篇論文構成一個邏輯嚴密的布局：各篇文章之間，三個部分之間大致呈現逐步推進、逐步深化、逐步展開的格局。從語言學至思想史，從思想史至文學史，作者在書中恰到好處地應用其豐富的學識，使讀者閱讀本書的感覺猶如也經歷了一次「跨文化」的「理論的旅行」。換一角度閱讀，即按照作者寫作的年代進行閱讀，又可讀出另一番不平凡的探索之途：最初的寫作來源於作者在復旦求學時對晚清詩界革命史實的若干考證：是誰在甚麼時間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詩界革命」的盛衰及其性質是甚麼？等等。也正是從這些充滿實證意義且不具思辯色彩的問題開始，作者在美國開始了長達十餘年中國「革命」意識形態史的探索。從「理論的旅行」到「跨語言實踐」，作者不斷汲取各種理論的營養，逐漸使問題從對一個文學口號的討論拓展為對中國現代語言史、思想史和文學史的整體性思考。他使得中國現代語言史的研究在社會思想史的層面上得到拓展，使得中國現代文學史得到一個全新的解釋體系，更使得人們明白，所謂中國思想史的重寫，並不僅僅在於更換敘述的角度。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1年4月號總第六十四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